

在我童年住的大院里,街坊们的称呼,很有些意思。看似约定俗成,却含有长幼尊卑的道德传统,也有看人眉眼高低的世俗心理。

对有一定文化的,坐办公室的,一律称为先生。叫先生的同时,人们一般会客气而有礼貌地点点头,微微欠身鞠个躬,完全是老派的礼数。我爸在税务局虽只是个20级的小科员,却有幸被称为先生。他非常高兴,每天推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就是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车,别看在单位里低眉垂眼谦卑得很,下班回家,走进大院,街坊们见到他,叫一声肖先生回来了!心里非常受用,破自行车跟着也抖落掉了一身的晦气。

在我们大院子里,被称为先生的人,并不多。中院的许先生是,因为是工程师。前院的张先生也是,因为在银行上班。黄老师也有文化,是中学俄文老师,人们叫他黄老师。梁老师是小学学校的校长,人们并不叫他梁校长。可以看出,老师的称谓,在街坊们的心里很重,重的是其中包含的文化,而不是职位。在我们大院子里,老师的地位和先生相等。但也有意外,许先生的儿子后来也当了小

街坊们的称呼

肖复兴

街坊们的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有直接叫名字的,建国、秀玲、小萍、小京……一般是老人叫年轻的后生。在这些称呼中,没有地位隐性成分,透着长辈的亲切之感,和邻里之间的和睦之感,让人们感觉到,远亲不如近邻。

常听见老人这么叫唤:秀玲,我这儿有新包的粽子,给你妈捎两只尝尝!或者:小京,看你们家有葱没,给我拿根儿去,我等着炆锅呢!

最有趣的是,在我们大院子里,不少街坊有外号,不知谁起的,大概不是出自一个人之口,属于群众智慧的结晶,口口相传的结果。比如,被公认全院最漂亮的女人,外号叫作“大摩登”。她徐娘半老,身材高挑,爱穿旗袍,进出大院,风摆柳枝,袅袅婷婷,听人们叫她“大摩登”,扭得更厉害了,分外得意。还有一个女人,说话,干事,很冲,蛮不吝,外号叫“二百五”。这个外号明显带有贬义,人们只是背后叫。但在大院子里,哪里有

是心里暗藏一丝瞧不起?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街

守得住的秘密,她肯定知道。能怎么办呢?能管住这么多人的嘴?爱叫叫去,听拉拉扯扯叫,还不种庄稼了!她就是这么说的,要不怎么说是个“二百五”呢?不过,我们大院子里,要是遇到事,需要有人出面给大家“拔创”或“顶雷”,这样容易得罪人的事,一般都会推举她去,这是对那个“二百五”外号的另一种诠释。

在我们大院子里,管有地位有文化年龄高的女人,叫太太,一般的家庭妇女,叫大妈或大婶。我们院的房东老太太,大家都叫她欧阳太,省略了一个“太”字,显得更亲近,更尊重。她是一位非常慈祥善良的老太太,虽然家里有钱,但从从不趾高气扬,而是平易近人,尤其同情接济生活贫寒的人家,我们大院子里很多人都得到过她的照顾。她很多子矮,长得胖,不知哪个孩子给她起了个外号“恨天高”,后来又有调皮孩子给她起了个新外号“长等于宽”。这样明显拿人的身体起外号,很不礼貌。但是,欧阳太,从不计较,听到有小孩子这么叫,也从不生气,一如既往对待大家。

我对欧阳太印象很深,前两年,在小说《兄弟俩》中,我专门写了她。

文俊在拓朴学、中国古代数学史和数学机械化三个领域,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卓越成就。

从吴文俊记事起,他就住在上海哈同路(今静安区铜仁路)民厚里。民厚里是石库门的典型代表,石库门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西合璧的典范。画家徐悲鸿和蒋碧微夫妇、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翻译家兼教育家严复,都在民厚里居住过。那儿也是海派文人的聚集地,戏剧家田汉寓居民厚北里时,他的学生施蛰存和戴望舒常来探望。民厚南里则住着他创造社的社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2001年,吴文俊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起荣获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9月,吴文俊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吴文俊祖居地究竟在嘉兴哪个县区?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嘉兴范围太大了,如果知道是哪个县哪个区就好了。我曾询问吴先生小儿子吴天骄和学生高小山、刘卓军,他们也只是知道是嘉兴。后来,通过高小



东风袅袅泛崇光 (中国画) 朱忠民

山教授,我与远在纽约的吴先生长女吴月明女士连上微信,她在询问了两个姐妹后,告知我说也只知道是嘉兴。而请教吴先生母校交大的数学学院现任院长楼元教授,他帮我查

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八月见》是未修订完成的书稿,马尔克斯遗言说不要出版;但我们也知道,卡夫卡之后,遗嘱被背叛是文学史的必然,甚至必要。死者没有话语权,即便他是马尔克斯。人世间对伟大文学的渴求,足以消弭背叛者的不安,也足以修补作者来不及修补的瑕疵,甚至让瑕疵变成作品的开放性的证明。

在这样的认知下去读《我们八月见》才对——去享受它,去抓紧它的每一次升华的瞬间——这是马尔克斯的遗产。马尔克斯毫不吝啬,这部遗著的展开,充满文辞的诱惑、满足,以及内心的折磨、顿悟和超越。

毋庸讳言,《我们八月见》主角安娜·玛格达莲娜和我同龄,这才是吸引我一拿到书就用半天时间一口气读完的主因,我想要知道大师眼中的中年困境如何度过。我和她一样都来到接近五十岁关头的门槛,她的烦恼也许比我要大:关乎婚姻关系和自身一生意义的反思,女性总是会比男人思虑更多。她和我一样本来打算以艺术和文学救赎自己,她的每一次冒险(或反冒险)的故事,必然伴随不同的音乐、舞蹈和书籍(也埋藏了不同的隐喻)。但最后,拯救她的竟然超乎这些圣物。

话说回来,写欲望是马尔克斯的拿手好戏,只见《我们八月见》在描写中摇曳多姿,随即摇摆出离,安娜经历了当代包法利夫人的骚动,但如何超越后者成为当代安娜·卡列尼娜的决绝?期间渲染了一个又一个爱人的登场,第一个最刻骨铭心,但竟然给她留一个无情的嘲讽;有的未能成事,反而折磨人心;有的掩藏在险象下面,像一个永不被揭穿的魔术……这些都无法剧透,你必须代入一个不甘人生就此落幕的美人,体验这一切最后的诱惑。

你以为安娜通过欲望的满足与不满终于也打发了自己?并没有,她在一年又一年的欢愉(有时未遂)中陷入巨大的虚无和对未来的眩晕,不知所措。直到神转折来临——货真价实的神转折,她发现了亡母的秘密,亡母在的在天之灵似乎看不下去安娜的痛苦,便以自身的罗曼史开示。

母亲的秘密特别提升了整部小说的能量,解决了之前的纠结。最后的升华甚至是东方式的——无欲则刚,安娜终于明悟情欲冒险的本质,得到解脱。剑兰是穿插在安娜与母亲、情人之间最多出现的意象,剑兰由安娜放在母亲墓前,又由爱人午夜送到安娜房间,最后得知母亲的爱人又年年如此把剑兰堆满了墓地……像这类马尔克斯擅长的象征符号游戏,其实不必过多挖掘阐释,反而要留意它的呼应。

比如说,蓝鹭,这黑夜之鸟,随一声惊雷消隐的欲望,此后在岛上不再出现。我们要问:剑兰所隐藏的,和蓝鹭所带走的,是否一样的悲欢、一样的人生价值?如果你的答案是“是”,那么你和马尔克斯、安娜一样,没有白白活过这辈子。

到的吴先生交大人籍卡上填写的祖籍地,干脆就是江苏青浦。

不过,在与吴月明女士的交谈中我得知,在她的记忆里爷爷吴福同先生曾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我想如果她的记忆准确的话,在上海市政协的档案室里,吴老先生的祖籍地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退一步,如果吴月明女士的记忆有偏差,她爷爷吴

福同担任的可能是上海市某个区的政协委员,那也是是可以查阅的。这可能是目前唯一可以查到吴文俊先生祖居地的线索。



寻数学家吴文俊祖居地

蔡天新

系苏浙沪三省市交会处。那时青浦隶属苏州市,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接壤。而吴先生的祖籍正是嘉兴,据说他的爷爷奶奶为了躲避战乱,携家迁到了青浦朱家角镇。朱家角镇属于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是上海四

大古镇之一。

据吴先生的口述自传《走自己的路》,他小时候,几乎每年清明都随家人回嘉兴祭祖。但他后来却记不得具体地点,只记得要坐船,慢慢地“漂”。去年端午节期间,笔者曾自驾到过嘉善和朱家角镇,个人推测吴先生的老家有可能是嘉善,但却缺乏证据。

吴文俊的父亲吴福同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读完了预科,相当于高中毕业。吴福同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英文基础非常扎实。毕业以后,他曾长期在上海一家出版医药专业书籍的书局从事编辑、翻译工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吴家有许多藏书,吴文俊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的藏书以及他们父子一起泡在书里的日子。他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后来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不久得以结识陈省身先生,并远赴法国留学,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众所周知,吴

中国电影的“发烧友”

列 孚

1982年春,意大利都灵,喜欢中国电影的欧洲观众很幸运地看上了135部从1925年至1981年间拍摄的中国电影。以陈荒煤为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率领了由田华、白杨、祝希娟等多名中国演员、导演等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了意大利都灵。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海外举办如此大规模的电影展映活动。135部电影作主题性放映,这样的活动在欧美也是难得一见。策划本次活动的是意大利人、中国电影的“疯狂发烧友”马可·穆勒。他曾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他曾匍匐着向章子怡施大礼,引起一时的轰动。他被称为“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1974年,马可·穆勒到了中国留学,学汉语。为什么学汉语?因为他喜欢中国电影。不仅要听得懂汉语,还需要用汉语与中国电影人交流。那段时间,只要知道北京某家影院有新片子放映,他就骑上他那辆破单车飞驰而去,可见他对中国电影完全入了迷。之后,马可·穆勒萌生了个宏大的计划:他想在意大利办一个中国电影展,告诉意大利人,中国电影是如此多姿多彩,目不暇接。那是一个宏伟的电影展映计划:150部电影,放映时间是三个月,除了都灵外,还在罗马和米兰公映500场,并邀请60名国际电影学者出席展映活动……这是一次世界电影史上空前的创举。1982年春,马可·穆勒梦想成真,他意气风发地在都灵举办了宏大的中国电影回顾展(1925—1981),其中包括《马路天使》《春蚕》《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天云山传奇》等等。其时我正主持电影杂志《中外影画》,获得他的邀请出席都灵中国电影展,非常荣幸。

我的观影生涯应该从襁褓中开始。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卫生员上门接生,我爸在一旁协助,据说最后的脐带就是我爸哆嗦着手一刀剪断的。几个月后,我就被抱在我妈怀里去连队俱乐部看电影——手扶拖拉机巡回放映队到连队了。这是那个时代生产建设兵团文化生活默认的规则。我一岁半被送回上海爷爷奶奶家,读了小学一年级上半学期之后,又去新疆待过一年多。在这段不长但已经可以记事的日子,至少经历了三次半夜被叫醒,在混沌中随着全体连队成员涌向俱乐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去看电影。一般会不停歇放映至少三部电影,《看不见的战线》《火车司机的儿子》《摘苹果的时候》……以至于我经常将这些影像相似

的情节混淆起来。

我两岁之前唯一的观影记忆是看到李玉和从床上起来,屋里踱步,再躺下。成年后我再未看过《红灯记》,至今不清楚那个片段来自真实记忆还是后期的想象。在上小学之前,我基本就学会了阅读。很多电影我至今没看过,但眼睛一闭上,就能极其丝滑地念出那一部部电影名字——《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橡树,十万火急》……还有一部片名迷人,内容不知所谓的《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我坚信,这个神秘音译背后,一定藏着令人震颤的奇异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上海,恰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

窝)热映。有天爷爷带我从小角场坐公交车去大光明门口等退票。一名黄牛居然向我爷爷报出了天价:每张五元。五块钱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大约是一个

从“瓦尔特”到“海上花”

费里尼

普通工人月薪的六分之一,也是当年实际票价的30倍以上。有一回爷爷从俄文词典里意外地翻出一张五块钱,结果全家美美包了一顿饺子吃。实在看不起,怅然若失的爷爷拉着我走人。好在那个时代电影下档之后很快就会在电视里上映。

1980年全家回到上海后,父亲在一家医院工作。导演田壮壮读北电时拍过一部儿童电影《红象》,这家医院俱乐部居

然就放过这部,我印象十分深刻,还记得小男孩名字叫“岩甩”。《红象》之后没多久,医院俱乐部居然又放映了田壮壮的《九月》。片子沉闷又好看,看完让我深沉了一个礼拜。

当年我十岁出头,已是《大众电影》的资深订户,知晓田壮壮的大名。连选两部田导作品,后一部至今在豆瓣上居然连评分都没有,我猜医院工会负责选片的那个家伙必然有着独特的品位。我之后进中学,当时学校定期组织学生看电影,得初二某学期,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五角场翔鹰电影院看《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维姆·文德斯,摄于1984年的名作。我一直怀疑本中学不俗的选片品位来自教务处一名曾经在20世纪80年

代初被公派赴欧美学习过的男性教师L。L后来也教英文。当然,“电影片单”有时也会流俗地选《鹰爪铁布衫》这样的武打片。那天刚散场,我被同班一女生拦下问道:最后那个捏碎鸡蛋的镜头是啥意思啊?我支支吾吾落荒而逃。

成年后至今唾手可得

十日谈

影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

在上海“爱”电影!它是一个永恒的邀约。